

类士群体与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的初创^{*}

王 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新加坡 637616)

[关键词] 新加坡; 类士群体; 文教事业; 文学活动; 文化空间

[摘要] 论文从早期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黄遵宪对新加坡文教事业的贡献, 流寓文人邱菽园主导的文学活动以及卫铸生、丘逢甲、康有为等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三个方面, 论证了一批华人“类士群体”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构新加坡本地文化空间、提高新加坡华人社群文化素养的中坚力量。这个类士群体的形成离不开两任驻新领事官所创办的文学社团的辛勤培育, 离不开寓居星洲的文化名人邱菽园的强力推动, 也离不开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这三方面的力量各有优势, 缺一不可。

[中图分类号] G119; G634.3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6)04-0010-09

Pseudo-Scholar Groups and Cultural Space in Early Singapore

WANG B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7616)

Key Words: Singapore; pseudo-scholar groups; culture and education; literary events; cultural space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a group of pseudo-scholars formed cultural space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refore improved Chinese immigrants' literac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group of people. For example, Chinese Consuls in Singapore—Zuo Binglong and Huang Zunxian, successively founded literary societies to promote literacy. Khoo Seok Wan, who was one of Singapore's literary pioneers, used his own newspaper and strong financial sources to establish literary societies and organize various activities. Meanwhile, Wei Zhusheng, Qiu Fengjia and Kang Youwei, who travelled to Southeast Asia,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space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 their various activities shaped the cultural space in early Singapore.

传统士人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士属于贵族下层, 可以接受教育, 拥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 士有志于道, 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一般认为, 士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以知识、道德和智慧为角色定位的社会特点, 他们是社会的精神生产者, 控制着社会生活中的理论话语权。但与此同时, 他们曾经受到的知识训练与将来承担的社会职务之间很难达致平衡。美国学者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就曾以明清士人为例指出: “在政务中,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 因为他们修习的是艺术; 而对艺术的爱好也是业余式的, 因为他们的职务是政务”。^[1] 而一旦这些具备双重“业余”特点的人群迁移至大清帝国以外的地方, “学而优则

[收稿日期] 2016-07-26; [修回日期] 2016-11-01

[作者简介] 王兵 (1979—), 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师、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东南亚汉诗。

* 本文为南洋理工大学 Tier 1 研究项目 (RP 6/14 WB) 成果。

仕”的情形便不复存在，反而更能够凸显其在文艺方面的卓越才能。正是这种灵活多变的角色定位，使得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早期新加坡华人社群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新客，也有少部分的土生华人，但毫无例外都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因此，其生活特征、思想和性格皆与传统的中国文人和书生相似，有专门以教学及文字为业的，也有分散在不同行业的，如工、商、医、艺、出版印刷及其他文化行业等。

在分析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的阶级结构时，多数学者并未充分注意到这批“文化人”的存在。如著名学者王赓武曾将海外华人移民笼统地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和“华裔”四大类，而将 19 世纪的海外华人社会主要分成“华商”和“华工”两大阶层。^[2]其后，澳洲华裔学者颜清湟对王赓武的分类法进行了修正，将 1800 年至 1911 年的华人社会分为“商”、“士”、“工”三类。其中，“商”概指资本家和普通商人；“工”包括手工艺者、店员、园丘工人、矿工和人力车夫等；而“士”则包括外国公司的文员、政府初级官员、通译员、教师和专业人士，其社会地位介于“商”和“工”之间。^[3]尽管颜清湟的分类中出现了“士”这一阶层，不过从其组成成员来看，还是不够周延。从事新加坡城隍信仰研究的徐李颖认为，新加坡早期的“士”还应包括中国南来的文人和通晓文墨的宗教人士，如邱菽园、释瑞于等。^[4]仅饶宗颐所编《清季来往新加坡人物表》，就罗列了 1866 年至 1911 年这四五十年来往星洲的一时俊彦共 59 人。^[5]而据叶钟铃统计的新加坡文学社团——图南社、会贤社与会吟社的课榜单显示，当时粗通诗文之“文化人”的数量更多，^[6]只是饶氏与叶氏并未将这些人上升至“士”阶层。香港学者梁元生则直接称之为士人阶层，并考察了这一阶层的起源、演化以及在新加坡儒学复兴中的作用。^[7]但是，他们毕竟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因为身处新加坡的士人可以以文艺为生，可以追求思想与心灵的自由，可以和传统的中国士人一样过着高雅脱俗的生活，但唯独缺少了通往科举功名的进路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志向。有鉴于此，笔者将早期新加坡的这些旧式文士称为“类士群体”，并主要探讨他们在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构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个人群的数量显然取决于当时民众的文化普及率。根据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统计，在 18 和 19 世纪的大清帝国，“基础文化在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中分布不平衡，30% ~ 45% 的男性居民具备某种读写能力，而具备这种读写能力的女性居民只有 2% ~ 10%”。^[8]而从计数写信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到文人学士们所具备的熟知经典、能诗善文的高等文化，据学者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化普及率的估计，“大概有 5% ~ 10% 的男性居民具备后一水平的文化”。^[9]以此比率来估算，当时下南洋人群中的“文化人”，应该是一个较为小众的群体。但是这个类士群体却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建构新加坡本地文化空间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创办了旨在进行文学教化的诗文社团，另一方面与过境文人诗文唱酬，拓展文化空间。自此南洋小岛文教振兴，传统文化日益昌隆。兹从三个方面分而论之。

一、早期驻新领事开创的文教事业

晚清帝国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官，实始于 1877 年。当年 10 月 5 日，新加坡政府公报承认华社领袖胡璇泽为中国领事。1880 年，胡氏病故，大清驻英公使曾纪泽委派其翻译官左秉隆担任驻新领事，于是左秉隆（1850—1924）成为第一位由大清帝国本土派来的正式领事，任期自 1881 年 9 月开始，直至 1891 年 5 月，长达十年之久。^①左秉隆，字子兴，1850 年出生于广州，15 岁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英语及各种西学课程，18 岁进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翻译官。后来受到曾纪泽的赏识和推荐，走上了专业外交官的仕途。需要说明的是，左秉隆虽然自幼学习西学，貌似不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但是其旧学功底不容小觑，尤好吟诗，著有《勤勉堂诗钞》。岭南著名诗人曾希颖评其诗“辞

^① 左秉隆在离开新加坡 16 年后，即 1907 年，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官，兼辖海峡殖民地，到 1910 年（宣统二年）9 月辞官退隐，但仍留寓新加坡。

不滞意，意能吸新，深入浅出，集元、白、苏、陆诸家，冶为一炉”。^[10]晚清翰林商衍瀛也有题诗称许：“风月收诗卷，壶觞入雅怀”。^[11]可见，左秉隆实际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新型士大夫。

大清在海外设置领事，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海外侨民的生命安全与正当权益，争取他们对于大清朝廷的效忠。左秉隆认为，保侨之道莫过于振兴文教。陈育崧曾将左秉隆在振兴文教方面的贡献概括为三点：一是义塾的倡设；二是文会的开办；三是英语雄辩会的主催。^[12]而这三件事皆与当地类士群体的形成有密切的关联。首先，新加坡公益性的私塾（义塾）的接连创办，培养了一大批接受传统华文文化教育的可塑之才。在左秉隆到新加坡之前，当地只有一所义塾——萃英书院，创立于1854年。左氏入星洲之后，积极推动兴学运动，前后开设了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屋等，弦诵之声，相闻于道。《叻报》曾有记载：“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13]因为有钱人才能请得起私塾老师，而义塾的学童来自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所以让大多数华侨子弟接受教育是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类士群体的重要途径。更有甚者，那些富裕华商还会出资遣送子弟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如恒春号邱正忠送其子邱菽园回籍受教应考、谦源公司黄福送其子黄景商返国读书中举。

其次，左秉隆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年（1882），就创设了会贤社。每月由左秉隆定出题目，称为月课。这是中国传统书院的习例，类似现代的征文比赛。继而当地文人学者按题发挥，作文交卷，并由领事本人或指定学者评定等次，分别给予奖励。优秀作品会在《叻报》上刊载。据学者梁元生的统计，仅从1887年8月至1891年6月，会贤社月课得奖人名单共有514人，去掉重复者，尚有219人。而若加上已呈交课卷但未得奖者，总数可能在千人之上。^[14]显然，这一批识文断字、舞文弄墨者在当时工商阶层占据主体的新加坡社会，承担着倡导风雅、以行教化的文化启蒙任务。

会吟社创设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考，但它的创立受到毓兰书室征联活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1889年3月，毓兰书室主持人王道宗以“毓兰”二字公开征联，“要将毓兰两字冠首，每联限以七字至十二字，并须贴切培养人才之意，方为合式，总以典雅、清新、自然为妙”。^[15]这次征联活动获得当地士人的热烈响应，共收到186联，邀请左秉隆评判前20名，左氏还亲撰6副联句送给毓兰书室。左秉隆通过此次征联活动的成功，看到了当地士人在吟联赋诗、唱酬切磋方面的需求，于是会吟社顺势设立。会吟社仿效会贤社的规例，每月以二字为题征联，左秉隆亲自负责出题和评阅，所有优胜诗联和得奖者名单都刊登在《叻报》上。其第一期联榜名录刊登时间为1889年5月31日，由此可以推算，会吟社的创立时间很可能在1889年的四五月间。左秉隆担任领事期间，会吟社至少举办了14期征联活动。^①据叶钟铃统计，这14期共有226人次获奖，去除重复者，实际获奖者尚有92人。^[16]以此推算，参与者的数量则要乘以数倍。

再次，左领事利用自身的双语优势创办了以英语为媒介的雄辩会，旨在拉拢与教化受英文教育的海外侨生。此辩论会自1882年创立，直至1890年才终止，且由左秉隆亲任主席。会务活动热烈而有序，众多峇峇（海峡土生华人）每两星期在领事馆集会一次，就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议题进行公开辩论。虽然这一部分土生华人已经不懂华文，身份认同也趋向多元，但通过积极争取，还是能够获得他们对于晚清帝国的认同。1889年新加坡举行光绪帝大婚庆祝会，雄辩会全体成员献上如下颂辞：“新加坡蕞尔小邦，华人居此者数十万众，无非阁下之子民也。若辈勤劳终日，为糊口计。大皇帝选贤与能，得人如公，领事是邦，于是民知忠君爱国之道，如今日之所表见者矣。民等忝为雄辩会之一员，受公之惠，实深且巨，砥励以道德，灌输以知识，民等爰趁此机会，特于大众之前，致其衷心之谢悃，惟公察之。”^[17]这段颂辞凸显了左秉隆在归化土生华人认同感方面所发挥的卓越贡献，也从另一个侧面

^① 学者梁元生和叶钟铃统计左秉隆任职期间的会吟社联榜皆至1889年12月20日停止。然是日联榜还附有下一期的征联启事：“兹将下期联题附录：对目○○○分○○○ ○○○折○○○限至十二月初三日截止。”（《叻报》1899年12月20日）这说明会吟社的征联活动应该持续到1890年，然获奖名单为何不见于《叻报》，原因待考。

证实当时的类士群体不仅指华文教育背景的侨民，也包括部分英文教育背景的土生华人。

新加坡类士群体的形成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左秉隆的离任而停滞。1891年11月，晚清帝国派来一位在文学方面更有造诣的黄遵宪出任新加坡升格之后的首任总领事官。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诗歌方面，他是“诗界革命”的主将，被梁启超评价为：“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18] 政治外交方面，他历任使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是晚清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黄遵宪就任总领事后，推动当地文教事业发展的举措主要有两件：一是改组会贤社，易名为图南社。黄遵宪曾在序文中宣称成立之意旨：“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窃冀数年之后，人才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此则区区之心，朝夕引领而企者矣。”^[19] 显然，他希望在他的引领之下，新加坡华侨的类士群体能够逐步扩大，繁荣当地学术文化，建构士子们对于中华帝国的认同。新加坡本地报纸《星报》亦发表专论，概括图南社创立的三个目的：尊王、重道和体恤寒士。^[20] 这样的表述更能确证图南社丕振文风表象的政治意图。

图南社的会务组织和管理模式基本延续前任左秉隆的会贤社，甚至连评阅和奖赏制度都基本相似，只是在选评标准和奖励形式、金额等方面有所差异而已。不过，二者月课的题目设置却有明显差别。其一，会贤社的课题内容多取材于四书五经，尤重《论语》，如“学而不思则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之类；而图南社的课题多关注现实问题。叶钟铃曾做过统计，黄遵宪主持的24期月课题目约可分为两类：一为中国问题，一为南洋问题。前者为17题，且涉及侨务有7题；后者22题，其中礼俗有8题。^[21] 如涉及新加坡本地的议题有：南洋华人子弟的教养，南洋华社设立商会，禁赌禁娼、南洋风俗优劣考等。涉及侨务的课题有美国限禁华人新例论、拟请派海军保护出洋华民论等，旨在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其二，会贤社题目形式主要是四书文，而图南社月课则除了传统的策论之外，还有旧体诗。最初图南社不出四书题，以南岛地方习此无用也。后来因应诸生之要求，才自1893年1月起设置此类题型。由此也可以看出，黄遵宪想要培养的不是那种专习举业的传统士大夫，而是好文辞、懂时务、工论说的新型知识精英。

黄遵宪的第二项文教功绩就是续办会吟社。他承继了左秉隆的做法，亲自出联题、亲自评判。优秀者不仅有奖赏，获奖名单及其作品还会刊登在报纸上，以期扩大影响。当然，黄遵宪的诗学造诣和评阅水平给会吟社的联课活动增色不少，甚至还吸引了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侨文学社团的注意。1893年2月至7月间，仰光闲来阁和映碧轩两个诗社先后邮寄数百份联课交由黄遵宪评阅，黄遵宪在身体有恙的情况下，仍亲自评阅和奖赏，并对仰光同好的联课水平大加赞赏。仰光文社联课的优胜作品也刊登在《星报》上，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新加坡本地士人吟诗作对的兴趣。

至黄遵宪于1894年11月卸任归国，三年期间图南社总计有24期月课，获奖总数达到938人次，去除重复者，获奖者也有391人。^[22] 会吟社联榜共有10期（第9、第10两期未公布得奖名单），获奖至少345人次，获奖者至少146人。较为特别的是，《星报》在刊登会吟社联榜时，在获奖卷数之外还注明收到的参赛卷数。就叶钟铃的统计来看，所收到的联课数量平均是获奖数量的5倍左右。^[23] 若以此来推算图南社的参与人数，当在2000人左右，会吟社的参与人数也达到700人上下。即使其间含有一些诗文兼工者，但19世纪末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出现一个人数可观的类士人群体，则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流寓文人主导的文学活动

在左秉隆、黄遵宪相继离任之后，流寓新加坡的知名文士邱菽园利用一己之财力，于1896年10月创办了丽泽社，1897年改为乐群文社。菽园先生本姓丘，晚清时为避孔子圣讳改为邱；名炜萇，号菽园、嘯虹生等。同治十三年（1874）生于福建海澄县。6岁入学就傅，8岁初至新加坡，

15岁时返原籍，应童子试。21岁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落第，绝意仕进。23岁时居香港，闻父病急赴新加坡，继承百万家产，倡立丽泽、会吟文社，以“星洲寓公”自号，星洲得名自此始。继而办《天南新报》，鼓吹维新；又与林文庆等创“新加坡华人女校”；与北婆罗洲国王立约，担保黄乃裳垦辟诗巫。戊戌政变后，迎康有为来星洲，慨捐巨款，助唐才常起义。34岁时破产。民国后，曾承办《振南日报》，历任星洲中华总商会秘书、《星洲日报》编辑等职。57岁时罹麻风病，1941年歿，享年68岁。一生笔耕不辍，著有《啸虹生诗钞》《菽园诗集》《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尘》《赘谈拾遗》等，至少有1500多首旧体诗词留世。

邱菽园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青年时期返乡应试，后来虽进士失利，然而也是当时新加坡唯一之举人，^[24]加之财力雄厚，便于兴学办报，因此很快成为本地之文坛领袖。丽泽社的创办宗旨与会贤社、图南社一样，组织社团“以便讲习”和教化，推行文风，“为后世之志艺文者筚路矣”。形式方面，课题文体初以诗联、诗唱为主，继而兼有制义、帖括、词章、时务文等；评点工作由邱菽园亲自主持，优胜者也会有现金或物质奖励，作品和榜单亦会刊登于《叻报》和《星报》上。效果方面，丽泽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不论是流寓南洋的文士还是在地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都很珍惜这个用诗文作品化民成俗的机会，故而参与者甚众。“季秋举办初课，一时间风奔辘，得卷千四百有奇。揭晓流寓十之九，土著十之一，亦云盛矣。”^[25]

丽泽社可以称得上是流寓文人领袖邱菽园主导、新加坡本地文人积极参与的民间文人团体，按理说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组织。但是至1897年冬，邱菽园及其同人将以诗歌为主的丽泽社扩充为“专重实学”和以文为主的乐群文社。对于此番转变，李庆年认为“其实就是鼓吹维新变法，借文社组织发挥影响力”。^[26]笔者基本同意李庆年的判断。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酝酿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而至1898年6月到9月的百日维新达至高潮。而1896年冬至1897年6月，邱菽园因为扶先父灵柩回乡安葬滞留国内，期间接受维新思想、重视实学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邱菽园最早接触维新思想不是在1896年底。实际上在丽泽社创办之前的1895年2月，他到北京参加会试时就已经参与了康、梁“公车上书”活动了。因此，乐群文社的创办宗旨与丽泽社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虽然乐群文社的“规模视昔为加广矣”，“然无所凭藉，无所师承，议论庞杂，弊将有视”，最终不得不“暂辍其役，以并力于经史正课”。^[27]显然，乐群文社鼓吹维新的目的并不理想，终于在1898年变法失败后迅即沉寂。

1924年初春，邱菽园又在陈延谦等商人的资助下创办了檀社。每月拟题赋唱，文友雅集，且选录三年来社员之优秀诗作结集出版，不仅惠及本地广大读者，还远播东南亚诸国。可见，通过文社修身养性、教化民众仍然是新加坡早期类士群体所持的基本理念。

此外，邱菽园还发起了其他类型的文学活动。1895年冬，邱菽园在绝意仕途之后，闲居乡里，因感于亡妻之题红楼梦旧作，遂信手拈来随意分咏得百余绝句，1898年经过一番增删欲结集出版，因而遍征题词，引起海内外诗友酬唱，终于汇刊成《红楼梦分咏绝句》一册。来自晚清帝国不同地区的文人与过访、寓居新加坡的文人围绕红楼文化相互唱酬，成为世纪之交一个颇为壮观的红学现象。^[28]同年10月，邱菽园请潮州画师余涛为他作《风月琴尊图》，邀请各地诗人名士约50人题诗，并汇集成册，其中不乏潘飞声、丘逢甲、王恩翔、林鹤年、康有为等知名文士。

三、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

过境文人在新加坡逗留时的诗作，笔者认为不应纳入新加坡旧体诗的范畴，但这并不表示过境文人对于新加坡的文学、文化没有产生影响。他们与流寓文人、土著文人的诗词唱酬一方面扩大了文士群体之间的交往，推动了文化各层面的交流，同时也拓展了新加坡的诗文空间，带动更多的在地文士参与其中，为当时的蛮荒小岛注入了浓厚的文化因子，甚至是思想的变革。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晚清帝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那些因公出访之官员、政

治流亡者、避难者往往以漫游的名义暂时离开，以期东山再起或另谋出路。而华人聚居的东南亚诸岛是他们较为理想的避风港。丘逢甲、许南英、康有为、郁达夫等皆如此。另外，1887年上海名士李钟钰游历新加坡，回国后出版了《新加坡风土记》一书，对新加坡的风土人情、社会面貌都有详细的记录，也吸引了晚清名士对于新加坡的浓厚兴趣。^[29]如62岁仍然执意游历南洋的卫铸生就有可能受到李钟钰这本著作的影响。当然如前文所述，在两任领事官的积极推动和业已寓居新加坡之文士的共同努力下，19世纪末的新加坡已经涌现出至少千人以上的知识群体，而此时的南洋小岛也不再是常人眼中的文化沙漠。

若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首先来看以诗交友的卫铸生。卫氏为晚清书法家和诗人，曾三次东游日本。1889年秋，寓居上海的卫铸生经由香港、西贡抵达新加坡，居留四个月。其在新加坡登山、望海、阅读、垂钓之余，即与当地文士诗词唱酬。卫氏诗句“明知作客谁非偶，却喜论交尚有人”^[30]也体现出他性好游历、善结知音的性格。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卫铸生与领事官左秉隆曾有多轮文字唱酬，相互抬举；同时也与寓居本地的不同职业和身份的文人叶季允、黄裳、李清辉、田嵩岳等有文字往来。由于他们唱酬的作品都刊载在当地的《叻报》上，因此对于本地诗风的发展极具推动作用。用学者梁元生的话说：“1889年，卫铸生所带来的诗的旋风，的确促使整个新加坡诗坛活跃起来”。^[31]

再来看兴学传教的丘逢甲。丘逢甲（1864—1912），出生于台湾，1889年中进士，1895年秋内渡广东，先在嘉应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是晚清非常有影响的诗人和教育家。1900年3月，丘逢甲被粤东当局派往南洋考察侨情，从潮州出发经由香港、西贡、高棉抵达新加坡。据史料记载，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调查侨民，监事联络。历英、法、荷等属，讲解说义，人心翕然，并筹款在汕头立校教授新学”。^[32]二是“联合南洋各埠粤商民……能以财力上报国家”。^[33]概言之，就是文化教化和筹款办学。

丘逢甲逗留新加坡期间，与之诗文互动最为频繁的就是邱菽园。^[34]而实际上，二人的交往在此之前已经开始。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1898—1905）在丘逢甲南游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一百余首丘逢甲的诗作、文章及对联，同时还将两人往来书函照登，且刊载有丘逢甲拟定的在潮州汕头创设粤东同文学堂的序文和章程。^[35]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人未到文名已响，所以本地名士对于丘逢甲的星洲之旅非常期待与重视。甫到新加坡，就接见许多侨界人士，并获邀演讲，行程扩大至马来半岛和印尼。需要注意的是，丘逢甲与邱菽园的诗歌唱酬并未跳出文士相互吹捧的局限，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议题。不过丘逢甲的两首《自题南洋行教图》却真实再现了在异域华育侨民的情景：“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二千五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36]高嘉谦评价说，“从保教保种到兴学，当地移民所追求的文化身份安顿与确立，为丘逢甲的教育事业，拓展了意想不到的文学空间”。^[37]笔者倒是认为，不论其政治使命为何，丘逢甲的南洋之行都在新加坡的文化界掀起了波澜，极大地调动了本地士子参与文教活动的热情。

另外，两人在1898—1899年的书信往来，以及丘逢甲在新加坡报章上发表的文章也触及到丘逢甲来新加坡兴学传教、育人救国的实际意图。据《丘逢甲集》统计，1898年，二人书信往来7次，1899年5次。其中还提及邱菽园已经受到丘逢甲的影响，在新加坡发起了“设学堂、开学会、祀孔子、建孔庙”等一连串活动。^[38]而1900年在邱菽园主办之《天南新报》上发表的文章多与兴学尊孔有关。由此可见，丘逢甲推广新学的主张获得了南洋华侨的良好反应，更多学堂的设立也为新加坡培育了更多传承中华文化的人才。

最后看诗作弥漫离散意识的康有为。1898年，康有为政变失败，随即清廷保守势力就开始追杀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因提前获得光绪帝密诏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赴港，从此展开长达16年的政治流亡生涯。据张克宏统计，康有为1900—1911年前后进出新马地区多达7次，主要居留地是新加坡和槟榔屿。每次时间长短不一，最久的一次长达一年半以上。^[39]康有为的南洋诗主要收录在其《大庇阁诗集》和《憩园诗集》之中，前者写于1900年2月至1901年12月逃亡新加坡、马六甲和檳

榔屿期间，凡 147 首；后者写于 1910 年至 1911 年避居新加坡期间，少数写于日本，共 51 首。

康有为能够避难至新加坡，完全出自邱菽园的鼎力相助。尽管他与邱菽园的关系历经分合，^[40]但在其南洋诗中，诗歌往来最为频密的还是邱菽园。康有为在抵新之前，就有诗答谢邱菽园的邀约：“漂泊寰瀛九万程，苍茫天地剩余生。……九州横睨呼谁救，只有天南龙啸声”。^[41]在新加坡期间，康有为先后住在邱菽园开设的恒春号店屋楼上的“客云庐”和恒春园南华楼，阅读邱菽园著作《菽园赘谈》并为之作序，同时还参加了邱菽园举办的题画诗活动，与同时期来访的丘逢甲等名士亦有诗歌往来。总之，他在政治活动之余，也积极参与了本地的文化活动，并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南洋诗。总体而言，不论是唱酬诗，还是自作之诗，康有为的南洋诗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主题上具有浓烈的感伤情绪和离散意识；二是在艺术上具有境界阔大、慷慨激昂的阳刚之美。如其《题邱菽园风月琴尊图》诗：“天风浩浩引飞舸，海月茫茫照醉歌。别造清凉新世界，遥伤破碎旧山河”。^[42]1900 年农历二月，正值康有为 43 岁生日时，他与同行友人梁铁君、汤觉顿在恒春园置酒话旧，吟唱出“天惜残躯经万死，生为大事岂前因”的诗句。^[43]

康有为作为一个流亡的晚清政治人物，他的离散汉诗创作能给新加坡带来何种冲击和影响，笔者借用西方汉学家卫德明所言的双重意涵来评价：“一是个人命运的情感隐喻；再者是流亡苦难在强大的传统处置和对应模式里，康有为仍透过历史与诗学想象，展现了上乘的诗艺，并由此构筑了一种在诗的本质持续保有新颖、自我和充满生命力的汉诗模式。”^[44]

若撇开康有为的政治身份，其戊戌以后的流亡诗篇中流露出的离散意识恰恰是南来文人名士所共有的文化体验。对于早期寓居新加坡的文人而言，他们不一定是政治的流亡者，但肯定都是离开文化母体的离散者。从这个意义来说，康有为南洋汉诗的离散意识可谓早期南来文人的精神内核。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早期一大批类士群体的形成是构建新加坡诗文空间的基石。而这一类士群体的形成离不开两任驻新领事官所创办的文学社团的辛勤培育，离不开寓居星洲的文化名人邱菽园的强力推动，也离不开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这三方面的力量各有优势，缺一不可。

其一，就诗歌创作而言，会吟社和丽泽社的诗课皆为诗联的形式，尽管这是诗歌创作训练中的重要一环，但还不是完整的诗歌创作。图南社的诗歌部分主要考察社员写作五言八韵的应制诗方面的能力，显然在抒发真性情方面不及过境文人与在地文人的诗歌唱酬。

其二，就培育文人群体而言，两任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和新加坡名人邱菽园都不遗余力，但在培训性质和范围上仍有些微不同。直至今日，学界仍无法证实领事官在新加坡成立文社是晚清官方行为，史料中亦不见相关的政府经费支持，这应该是左、黄二人在面对侨民文化现状时个人的一种自觉行为。但即便如此，囿于他们的驻外领事官的身份以及他们推行圣道教化的目的，不得不让人猜测他们创立的文学社团具有半官方的性质。与之类比，邱菽园的丽泽社、乐群社也具备文学教化的功能，但是这些文学社团显然是民间的自发的行为，因此活动组织以及社团宗旨等皆不够稳定和长远。

其三，就推动本地文风而言，文学社团、文化领袖和过境文人皆有贡献。《新加坡风土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45]而这“文风”就是此后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滥觞。文化领袖邱菽园对于丕振本地文风更是厥功至伟。他不仅凭借自身财力和创办报纸之便利，创设丽泽、乐群、檀社等文学社团，与过境文人的唱酬更是为人称道。其《挥麈拾遗》有曰：“近四五年中，余所识能诗之士流寓星洲者，先后凡数十辈，固南洋荒服历来未有之盛也。”邱菽园在文中列举了十一位诗友姓名之后指出，“方其先后小住星洲，余得趋陪雅集，时而同窗话雨，时而分树看花，赌酒弦诗，兴复不浅。”^[46]很难想象，没有文化名人的登高一呼和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坛会是怎样的黯淡图景。

[注释]

- [1]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ol. 1, 1968, p. 19.
- [2]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3-21.
- [3] 颜清煌:《新马华人社会地位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1800—1911)》,颜清煌:《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2年,第149~178页。
- [4] 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7年,第32页。
- [5] 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附录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5~328页。
- [6] 叶钟铃:《黄遵宪与南洋文学》,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2年,第12~80页。
- [7] 梁元生:《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士”阶层之分析》,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第9~30页。
- [8]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 23.
- [9] Gilbert Rozman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p.186.
- [10] 曾希颖:《勤勉堂诗钞序》,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卷首,第6页。
- [11] 商衍瀛:《题勤勉堂诗钞》,左秉隆:《勤勉堂诗钞》,卷首题辞,第1页。
- [12]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左秉隆:《勤勉堂诗钞》,第4~5页。
- [13] [新加坡]《叻报》1890年3月13日。
- [14] 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第21~22页。
- [15] 《楹联求教》,《叻报》1889年3月15日。
- [16] 叶钟铃:《左秉隆与会吟社》,《中教学报》2001年第27期。
- [17] 转引自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左秉隆:《勤勉堂诗钞》卷首,第5页。
- [18]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全集》第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310页。
- [19] 黄遵宪:《图南社序》,《叻报》1892年1月1日。
- [20] [新加坡]《星报》1892年1月6日。
- [21] 叶钟铃:《黄遵宪与南洋文学》,第51~76页。
- [22] 叶钟铃:《黄遵宪与南洋文学》,第77~80页。
- [23] 叶钟铃:《黄遵宪与南洋文学》,第12~14页。
- [24] 杜南发策划,李永乐、韩山元、许月英联合报导:《名士也风流》,新加坡《联合晚报》1985年3月3日。
- [25] 邱炜萇:《五百石洞天挥麈》,光绪二十五年邱氏粤垣刻本,卷二,第28页。
- [26]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 [27] 邱炜萇:《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二,第28页下。
- [28] 参见吴盈静:《清代台湾红学初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第319~347页。
- [29] 参见朱杰勤:《〈新加坡风土记〉的作者李钟钰》,《亚洲文化》1985年第5期。
- [30] 卫铸生:《甫抵岛漫赋》其一,《叻报》1889年9月14日。
- [31] 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第31~45页。
- [32] 邱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附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3页。
- [33] 丘逢甲:《复沈黎斋信》,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下编,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810页。
- [34] 参见丘铸昌:《丘逢甲与丘菽园的交往》,丘铸昌:《丘逢甲交往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46页。
- [35] 关于丘逢甲诗文在《天南新报》登载的出处,参见王慷鼎:《新马报章所见丘逢甲诗文及有关数据目录初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 [36] 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第470页。
- [37] 高嘉谦:《帝国、诗与孔教的流亡:论丘逢甲与康有为的南洋诗》,吴盛青、高嘉谦编:《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 [38] 丘逢甲:《致丘菽园信五封·复菽园》,《丘逢甲集》下编,第794页。
- [39] 参见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第101页。
- [40] 参见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和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和八方文化出版社,2001年。
- [41] 康有为:《菽园投书邀往星坡,答谢》,《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 [42]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202页。
- [43]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201页。
- [44] Hullmut Wilhelm, “The Poems from the Hall of Obscured Brightness”, see Jung-pang Lo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pp. 323-324.
- [45]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第10页。
- [46] 邱炜萆:《挥麈拾遗》,上海:星洲观天演斋丛书,卷五,1901年,第6页。

[责任编辑:张焕萍]

· 书讯 ·

《缅甸华侨华人史》出版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院长范宏伟教授的新著《缅甸华侨华人史》于2016年7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本书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侨史工程系列丛书,是中国侨联重点课题和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项后期资助的研究成果。

无论是在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上,还是在中缅关系史上,总体来说,缅甸华侨华人一直是个不太为学术界、媒体和观察家们所充分关注的群体。范宏伟教授克服了资料匮乏带来的研究障碍和困难,经过十余年的跟踪关注,多次前往缅甸进行田野调查,不断搜集、积累资料,最终完成了这本《缅甸华侨华人史》,填补了长期以来没有一本专门、全面研究缅甸华侨历史学术著作的空白。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缅甸华侨华人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全书以两次世界大战、缅甸独立、新中国成立、冷战兴起等一个个影响缅甸华侨华人命运的历史时期为节点,分为七个章节。各章分别为“独立以前的缅华社会”“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时期的缅甸华侨华人”“奈温军政府初期的华侨华人”“1967年‘6·26’仰光排华事件”“奈温时代中后期的缅甸华侨华人(1970-1988)”“新军政府时期的缅甸华侨华人(1988-2011)”“华印社会比较”。该书除了从纵向维度对缅华社会的历史进行探讨以外,还从横向的角度对缅甸华人和印度人两个族群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者的规律性特征。(重光)